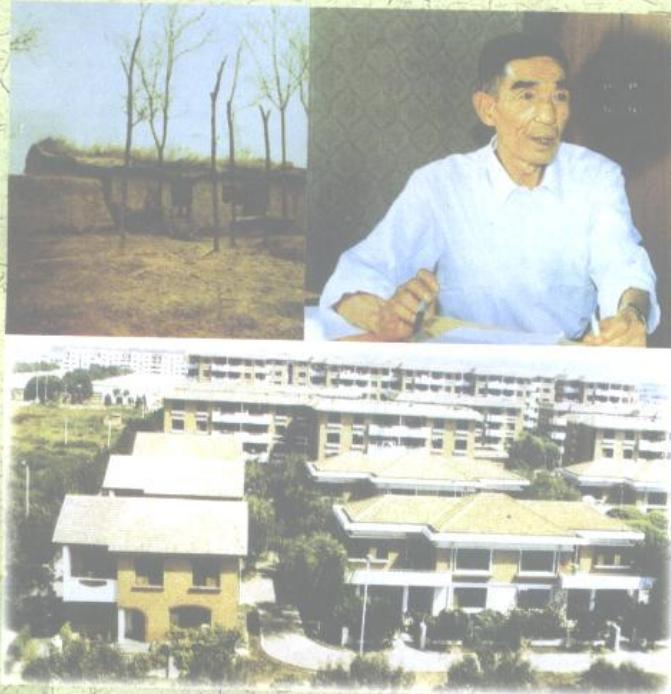


禹作敏之谜

花蕾·东其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96709

禹作敏之谜

花蕾·东其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2014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禹作敏之谜/花蕾、东其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3

ISBN 7—80088—528—3

I. 禹… II. 花…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②禹作敏生平经历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4355 号

(京)新登字 022 号

* * *

禹作敏之谜

花蕾 东其 著

责编 向飞 吕晓清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河海大学印刷厂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数 13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3200 册 定价: 8.70 元

ISBN7—80088—528—3/I · 61

目 录

一 序 曲	(1)
●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禹作敏应召前来晋见新任市委书记，但瞬间由名人成为阶下囚。	
●一则简短的消息震惊全国。有人议论，有人猜测，更多的人困惑。	
二 贫困中的“燕赵悲歌”	(5)
●在贫困的大邱庄，“砖头砸死人不偿命”——因为，大邱庄根本就没有砖头。	
●60年代的生产队队长禹作敏，因为正直能干而被称为“神仙”，深受社员拥戴。	
●70年代初，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铁面无私，有贪污行为的亲侄子卧轨自杀。	
●慷慨激昂的禹作敏流着眼泪，恳求乡亲们让他再干三年。	
●大邱庄办起了第一个工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虽然中间也有曲折，但雪球终于越滚越大。	

7/92/07

三 大邱庄和禹作敏名扬天下 (23)

- 贫瘠地倏然崛起新都市，中外人刮目相看大邱庄。
 - “孔雀东南飞”，各地精英纷纷投奔大邱庄。
 - 一对地主的儿女，荣耀地为大邱庄捧回了法国农业骑士勋章。
 - 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大邱庄究竟靠什么致富？
-

四 光环下的禹作敏 (39)

- 禹作敏敢于用人，用各种各样的人。
 - 禹作敏敢于“篡改”和顶住县、市乃至中央的规定和指示。
 - 禹作敏的“政治经济学”——“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
 - 禹作敏的牢骚常常不断，在各种场合都敢发。
 - 禹作敏对蒋子龙很不满意。
 - 禹作敏问邓小平的女儿：“黑猫白猫的理论还算不算数？”
 - 禹作敏慷慨地无偿支援小靳庄，又送给郭凤莲一笔巨款。
-

五 禹作敏与“乌托邦” (66)

- 古今中外同一梦，禹作敏力求梦想成真。
- 禹作敏最后一个告别茅草屋，搬入新楼房。
- 大邱庄各尽所能，老有所养、所乐。
- 为了让那些没结婚的人成个家，禹作敏号召人人当“红娘”。

- 禹作敏身体力行,积极倡导“新生活”。
 - 禹作敏的文化不高,但他对办教育却十分热情。
 - 为了计划生育,禹作敏给妇女们出了一个选择题。
-

六 毕竟,他只能是农民 (90)

- 农民就是农民,决不可能是“××家”。
 - 禹作敏动不动就抬出“农民”的身份来,其实,他最怕人拿他当农民看待。
 - 禹作敏的“汽车理论”。
 - 禹作敏很相信“风水”。
 - 禹作敏要把《正大综艺》改为“大邱庄综艺”,还打算引进一百名外国最漂亮的姑娘,与大邱庄一百个最聪明的小伙子相配。
 - 禹作敏如此解释骄傲和谦虚。
-

七 禹作敏没能逃出“周期率” (109)

- 先哲们说过:“不受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而禹作敏恰恰也拥有这样的权力。
 - 禹作敏说:“我去掉‘土’字就是皇帝。”
 - 禹作敏预料到可能被打倒,着手安排身后事:立传、传位。
 - 1990年春,大邱庄发生了第一起血案。
 -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禹作敏亲信的屁股也摸不得。
-

八 禹作敏兵败“滑铁卢” (133)

- 禹作敏倒台,并非没有任何预兆和忠告,只是

“庄主”没有听信罢了。

- 危福合之死,点燃了导火线。
 - 公安干警二进大邱庄,禹作敏不得不开始让步。
 - 禹作敏等人纷纷落网,公安机关巧选预审突破口。
-

九 国徽下的审判 (157)

- 禹作敏走上了被告席,毫无表情的脸让人有点难以捉摸。
 - 禹作敏终于承认了窝藏罪。
 - 禹作敏等人犯有妨碍公务罪。
 - 对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禹作敏等人供认不讳。
 - 为了探取情报,禹作敏曾向一个高干行贿。
 - 禹作敏认为,检察院对他的起诉恰如其分。
 - 律师努力开脱,禹作敏沉重地垂下了头,表示决不上诉。
-

十 也算尾声 (185)

- 一纸判决,在大陆和港澳激起了阵阵波澜。
- 试看今日大邱庄——风雨后依然是百花吐艳。
- 禹作敏仍在狱中服刑,石家明最先期满,再次回到大邱庄。

一、序曲

●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禹作敏应召前来晋见新任市委书记，但瞬间由名人成为阶下囚。

1993年4月中旬，东风和煦，艳阳高照。蔚蓝的天空白云朵朵，辽阔的大地绿苗片片。恪守自然规律的春色轻柔地沐浴着华北大地，赋予这片土地以盎然生机。

天津市静海县蔡公庄乡大邱庄村也不例外地融化于醉人的春意之中。各色花儿绽开了，各种树叶碧翠欲滴，普通村民的排排楼房和村干部的栋栋别墅在温和而热烈的阳光下闪亮。整个村庄沉浸 in 一片安详静谧的气氛中。

然而，可人的春光并不能使禹作敏平静下来。这位大邱庄奇迹的主创者，使大邱庄这个名不经传的贫穷小村奇迹般地成为富甲全国的“华夏第一村”，从而多年来当之无愧地稳坐大邱庄的第一把交椅。禹作敏本来就具有自信的性格，巨大的成功又使这种自信进而演化为果断、坚定。多少艰难，多少险阻，他都大智大勇地闯过了。但此时，他却辗转反侧，焦躁不安。

因危福合之死而作为导火线的风波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禹作敏等人的状况越来越被动，步步退守，但目前从总体上来讲，仍大体处于大邱庄与公安部门相对峙的状态。禹作敏

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看起来短暂的平稳之中隐伏着怕人的危机，这场严重的风波总要有个结局。

禹作敏反复揣测，平生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已经把握不准，掌握不住自己本人和大邱庄的命运。刚刚接到市委的紧急通知，说是刚刚上任的新市委书记要见他。如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级干部能够被市委书记专门召见，那他也许会如临梦境，受宠若惊。然而禹作敏不同。他是声贯全国，名闻全球的人，像市委书记一级的干部他见得多了。中央的领导都能到大邱庄来，新市委书记当然也可以来。但现在书记却没来，而是召他去。是去，还是不去？如果不去，可以随便编个理由，但这样一来，不仅违反了组织纪律，而且从情理上讲也有点过分，并且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去，实在有些吉凶难卜。

最终，禹作敏决定还是应约前往。他不了解新书记的性格和对大邱庄以及危福合风波的看法，前去晋见不仅表示礼貌和尊重，而且还能趁机向这位天津市的最高领导人面陈理由和委屈，对其的立场确立起到重大的作用。以前，禹作敏早已忘记了直接上级乡领导，对静海县委的那些头头更是置若罔闻，对市里的指示也常不以为然。而此时，他却前所未有地感到领导的态度和支持对他和大邱庄来说如此重要。

为了防备意外，也为了给自己壮胆，禹作敏挑选了八个身强力壮、忠心耿耿的保镖，分乘四辆轿车，鱼贯离开大邱庄，驶向天津市里。

五十公里的路程，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大门口，保卫人员礼貌地告诉他们：上面吩咐只让禹书记的车进去，其他人一律远离。

禹作敏感到有些不悦和不祥，但也只能从命。车子在院内

停稳，他略带疑惑地走出来，跟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进入指定的房间。

等待禹作敏的没有市委书记，只有几名神色严峻，全副武装的干警。

●一则简短的消息震惊全国。有人议论，有人猜测，更多的人困惑。

1993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4月15日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去年12月13日，大邱庄发生了一起非法拘禁、殴打职工危福合致死案。在侦破此案过程中，发现禹作敏有包庇、窝藏罪犯和用非法手段阻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等犯罪行为，触犯了刑律，司法机关将依法对其进行审理。

消息不长，仅仅100多字，但是在中华大地引起的震波却不亚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有人感到突然，迷惑不解；有人相信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有人急于了解禹作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人猜测这件事之后有没有更深的政治背景。

很多人熟悉禹作敏的名字。《中国当代名人录》对禹作敏是这样介绍的：

禹作敏，1929年生，天津市人。现任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至1987年被授予天津市优秀企业家称号，并荣获最高

人才金杯奖，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作品有《大邱庄崛起之谜》。

禹作敏是以改革出名的。他与大邱庄不可分割似地连在了一起。他没有像某些被誉为改革家的人那样无所作为、昙花一现，而是靠着顽强的努力，在一片异常贫瘠的土地上写下了新美的文字，画上了新美的画图。人们想起富甲全国的大邱庄，就想起禹作敏，想起禹作敏，就想起“华夏第一村”的大邱庄。同时，人们还会很自然地想起曾经同样是农村最基层干部的陈永贵和其领导下的大寨。

但大邱庄与大寨不一样，禹作敏也与陈永贵不同。大寨是以战天斗地、艰苦奋斗的精神名声远播，而大邱庄则是以泛舟市场经济，迅速致富而名誉显赫。陈永贵直到当了副总理也仍然未改那一身土气，而禹作敏则是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乘着中央干部才有的高级轿车。在1992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文艺晚会上，这个面孔黑瘦、满脸皱纹、留着短平头的农民频频出现在屏幕上，被采访时一语中的，一语惊人。

也许是从名人到阶下囚这个过程转变得太突然了，各种或真或假，或猜测或杜撰的消息不胫而走。

面对拘留证，禹作敏曾拒绝签字，并用他浓重的乡音气势汹汹地问：“我有嘛罪？”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他多次充满感情地回顾起自己的奋斗史，回顾起他对大邱庄的繁荣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是的，禹作敏的功劳，人们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禹作敏的错误，法律不会宽恕，也不应该宽恕。禹作敏从普通农民成为名人，又从名人成为罪犯，颇值思考和玩味。有人说，禹作敏本身就是一个谜，这个谜值得一解。

二、贫困中的“燕赵悲歌”

- 在贫困的大邱庄，“砖头砸死人不偿命”——
因为，大邱庄根本就没有砖头。

河北、北京、天津一带在战国时期是燕国和赵国的国土。这里，西北部有燕山、太行山，东临渤海，中部有白洋淀，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适于农业耕作，因而成为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在这片土地上产生了多少英雄豪杰，为后人所传颂，为世代所景仰。大邱庄，就坐落在这片土地的怀抱中。

大邱庄曾与江南的华西村齐名，一北一南，相映生辉。然而，华西村地处自古就是人杰地灵的鱼米之乡，而大邱庄却几乎是恰恰相反。它贫穷，它落后，贫穷落后得与中国许多贫穷地区的贫穷村庄一样。

70年代初期，被流放在团泊洼的国家文化部五七干校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写过一首《团泊洼的秋天》，用脍炙人口的诗句这样描写：

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
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

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
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

秋天的团泊洼啊，好像在香甜的梦中睡傻；
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

其实，那不过是自然环境和景物在诗人的眼中和笔下被美化了而已。实际上，位于静海县城东部的团泊洼，是历史上泄洪形成的一片洼地，自古就是沼泽密布，芦苇丛生，盐碱水害，土匪出没。即使是在被郭小川讴歌的时候，也仍然是一块旱季白茫茫，涝季水汪汪的不毛之地。

从形状上看，团泊洼像一口被抛弃不用的巨大铁锅，大邱庄就坐落在这口锅的底部。它平均海拔高度2.4米，自然降水少，春旱夏涝，农业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因为大邱庄位于独流减河之南、静海县城以东，所以被人们称为“老东乡”。这里土地不少，但盐碱得厉害，往地下挖一米，冒出来的还是咸水，庄稼长不好，满地尽荒芜。在秋日的黄昏，华北平原特有的灰色

大地与灰色茅草房形成了它特有的混浊与苍茫，使人难以看到生机和活力。治伏盐碱，是庄稼生长的关键所在。60年代，这一带的人们发明了一种修台田治理盐碱的方法。他们在地上挖出一条条大沟，把取出的土垫到地上，这样就可以减少地下碱水的渗透，为庄稼生长提供一席之地。但年深日久，沟越挖越深，土越垫越高，形成了一种类似陕北塬地的人造“塬地”。这种修修补补的办法就像治理黄河一样，堤岸长河底也长，地高碱也往上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们下地耕作却要翻过自己制造的许多沟和坡。

在五星红旗升起之前，大邱庄是一个佃户村。即使是相对富裕的地主，住的也是茅草房，只是盖房时，可以在房顶架五根檩，因而宽大一些而已。普通农民则只能盖三檩房，也就更加矮小，这样就显示出等级的不同。那时，有一首歌谣生动地描绘出了这里的贫穷：“老东乡，老东乡，喝苦水，吃菜帮，糠菜半年粮；宁吃十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为了本能的满足，更为了生命的延续，大邱庄人采取的办法是，本村闺女不外嫁，自己村人和自己村人成亲，与故土共存亡。那时，全村数一数二的地主，有200多顷地，一年也吃不上几顿饺子。即使逢年过节吃上一次，除了老地主吃白面的以外，地主婆以下全吃高粱面加榆树皮的。除夕晚上，老地主亲自给三个儿媳妇每人发三粒大麻子，叫她们穿起来点上当守岁的灯用。其他佃户的贫困就更可想而知了。

解放后，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有所发展，但仍然没有摆脱贫困。1963年，一场大洪水冲垮了全村所有的茅草屋，大水退后，重建家园，盖的还是茅草屋。直到1978年，我们祖先发明的秦砖汉瓦也没有在这个村子抛头露面。当时人

们有一句歇后语：“砖头砸死人不偿命——没有。”因为在静海县谁都知道大邱庄没有一块砖头，所以也就不相信用砖头打人的事。“文革”十年，3000多人口的大邱庄，娶上媳妇的男青年只有三个，1976年，中老年光棍达152人。所以，凡是有能力有办法的人都想方设法往外跑，离开这块土地，去寻找自己的出路。

统计数字表明：1949年，全村275户，1650人，耕地10520亩，产粮67万斤，人均406斤，年人均收入46元。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粮食产量均在60万斤左右，人均300至400斤，年人均收入40至50元。全村公共积累，1956年是15.4万元，1965年是1.638万元。1966年因“文革”冲击，人均粮食只有351斤，年人均收入30元。1953年至1968年，16年中有八年没向国家交公粮，还吃了返销粮。即使是夏天走进大邱庄，看到的也是盐碱地上稀稀拉拉地长着并不茂盛的庄稼，全村没有几棵树，光秃秃的低矮的茅草房，人们吃的是下雨后流到坑里的水，穿的是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的破旧衣服。除了孩子们追逐跳跃显示出一点生气以外，成年人表情呆板。轰轰烈烈的学大寨没有给他们带来生机；学小靳庄，唱样板戏，也解决不了他们的贫穷问题。

●60年代的生产队队长禹作敏，因为正直能干而被称为“神仙”，深受社员拥戴。

禹作敏是土生土长的大邱庄人。他的个头即使用现在姑娘找对象的标准来衡量也足以达标了——一米七五。只是他

显得黄瘦且有点单薄，但两道浓浓黑黑的眉毛和一个高大的鼻子却给他增添了不少威严。

禹作敏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他只利用冬闲时间读过几个月的私塾，离知识分子的分儿少说也有十万八千里的路程。但与他一起上学的伙伴识不了多少字，而禹作敏却能读书看报写文章。他从1954年就开始当干部，公社化时当大队会计，虽说没学过会计业务，但算盘却拨得哗啦响，账本搞得顶呱呱。可惜他在仕途上一直进步不大，据说是受了他大哥的影响。他大哥是个头脑活络的人，不满足于土里刨食的苦日子，常常搞贩运牲口。那年头，干这个自然是违法的，就被送到大牢里改造了几年。到“大跃进”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说是一亩地能生产粮食几十万斤，一夜间能够建起多少多少工厂。大邱庄大队大队长禹作敏硬是不相信，自己也不放。就这样，大队长的乌纱帽丢了，被下放到全大队最穷的十一生产小队当社员，还差点连党籍也没保住。

上级批评他，处分他，但老百姓说他好。在社员们的一再要求和苦缠硬磨下，本已对当官心灰意冷的禹作敏接过了小队长这个差事。

1963年，华北地区暴雨滂沱，洪水滔滔。中央下令：保卫天津，保卫津浦铁路。实行分洪，淹掉团泊洼！大邱庄接到紧急通知，全村必须在两个小时内全部撤出。

消息传来，本来就已饥饿得皮包骨头的大邱庄人更如大难临头，天塌一般。全村一片男哭女叫，老喊少啼，乱作一团。干部顾不得群众，群众找不到干部，各自为战，仓皇逃命。

唯有第十一生产队没有乱，没有散，因为禹作敏是这个队的队长。禹作敏强压住内心的恐慌，声嘶力竭地对着他惊慌失

措的下属们高喊：“大伙要是信得过我，我领大伙一块走！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会丢了大家！”

六神无主的人们像找到了主心骨，像是在茫茫的洪水中抓住了一块木板。扶老携幼，用小车推着可怜的值钱家当，带着镰刀和扁担跟着禹作敏出发了。几经周折，最后来到天津东郊区扎下临时营寨。

国家对这些背井离乡的灾民每天供应八两粮食，同时发放一些千方百计募捐来的旧衣服。半饥半饱、半暖半寒的人们整天忧心忡忡而又无可奈何地蹲墙跟，晒太阳。禹作敏闲不住，瞎转悠中发现附近有个造纸厂，急需劳力运送造纸的原料稻草。他心头一亮，立即把这桩活计揽了过来。逃难用的小车和扁担、绳索派了用场，逃难的居然成了打工的。临近年底，洪水退却返回家园时，每个劳力分了 400 元。真真是因祸得福，这次大灾中，禹作敏的生产队不仅没散伙，反倒成了公社化几年来收入最高的一年。

也许是乐极生悲，有个社员竟然把刚到手的 400 元钱丢了。400 元，在那个年代，在那种环境下，实在是个性命交关的数字啊！望着那位痛不欲生，寻死觅活的社员，禹作敏一咬牙，从自己的一份中抽出 200 元给了他。那丢钱的壮汉子一下跪了下来，抱着禹作敏的两腿又痛哭流涕起来。

人们陆续回到了大邱庄。遭受过灭顶之灾的家园已满目苍凉，面目皆非。社员们还没有从惊吓、劳累和悲伤中苏醒过来，禹作敏就召集十一队的社员开会。他说：“我到大洼深处的苇地看了，苇根都被泡烂了。那地没主，但准肥！咱们开出来种庄稼，准有好收成！”

有人表示怀疑，说：“开那烂泥地多累人不算，弄不好还白